



新中國是怎樣誕生和成長的

廖 蓋 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中國是怎樣誕生和成長的

廖 蓋 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880

新中國是怎樣誕生和成長的

廖 蓋 隆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10

開本 850×1168 毫 1/32 印張 8 1/8 字數 195,000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2,000

目 次

第一章	序論	1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1
第二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	7
第三節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	13
第四節	抗日戰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25
第二章	國民黨反動派發動新的大內戰	44
———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		
第一節	戰後的世界和戰後的中國	44
第二節	國民黨搶奪人民的勝利果實	50
第三節	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	53
第四節	國民黨依靠美國支持撕毀“雙十協定”	55
第五節	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	59
第六節	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	64
第三章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防禦階段	68
———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		
第一節	國民黨的瘋狂進攻	68
第二節	“勝利”沖昏頭腦	71
第三節	毛澤東說：蔣軍必敗	76
第四節	殲滅反革命的有生力量	79
第五節	國民黨區的愛國民主運動	83

第四章	由防禦轉入進攻	87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		
第一節	全國性大進攻的開始	87
第二節	土地改革	93
第三節	統一戰線	98
第四節	反革命陣營的瘋狂掙扎	103
第五節	反對迫害，反對美國扶植日本	107
第五章	決定的勝利	110
———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第一節	濟南、遼瀋、淮海、平津張之戰	110
第二節	戰犯集團“和平”攻勢的破產	114
第三節	進軍令下，國民黨反動政府滅亡	120
第四節	追奔逐北，解放全部中國大陸	122
第六章	新中國的誕生	126
第一節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	126
第二節	開國盛會	133
第三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38
第四節	中國人民為什麼能夠建立新中國？	140
第五節	新中國的誕生，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勝利	147
第七章	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	152
———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		
第一節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建設工作時期	152
第二節	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保衛和平而鬥爭	159

第三節	各項社會民主改革的完成和人民 民主專政的鞏固	171
第四節	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完成	182
第八章	國民經濟有計劃建設時期的開始	193
———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		
第一節	國民經濟有計劃建設時期的開始和黨在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佈	194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207
第三節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	212
第四節	為保衛國際和平而努力的新成就	231
改版書後		249

20150406

第一章 序 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代表全中國六萬萬餘人民，作了這樣的歷史性的宣告。這是震撼中國和震撼全世界的聲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這一天，就是一個歷史的分水嶺，它標誌着舊的中國已經滅亡，新的中國已經誕生，中國人民已經由被壓迫者變成了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

新的中國，是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勝利的產物。這本書主要地（從本書的第二章到第八章）就是要將這一個時期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頭五年內的歷史事實，作一個簡單的連貫的敘述。可是，新的中國，不僅是最近一次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產物，而且又是近百年來，特別是近三十年來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就是現代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和領導核心。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中國人民就不會得到大翻身，舊的中國就不會滅亡，新的中國就不會誕生和迅速地成長起來的。因此，這本小書的第一章，將簡單地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及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結果。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一方面使中國由獨立國變

爲受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在客觀上曾對中國封建經濟起了分解的作用，對中國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刺激的作用，使中國由完全的封建社會變爲半封建社會。中國的近代工業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即開始出現，到了二十世紀初葉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發展，產生和發展了中國的近代產業無產階級。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夜，這個階級的人數共有二百五十萬到三百萬。這個階級是最受壓迫的，一無所有的，因此也是最革命的；這個階級和最先進的機器大工業生產聯繫着，因此最有發展前途；這個階級又因爲在集中的、交通發達的城市和工業區域的大企業中工作，最有組織性、紀律性，最容易團結起來。這一切就使得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成爲中國人民爭取解放鬥爭的領導階級。這個階級由於受到帝國主義者和本國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壓迫，曾自發地起來反抗。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中，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中國近代產業無產階級開始表現出自己的力量。上海、唐山、北京、長辛店等地的工人，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罷工，參加了全國人民的五四反帝國主義鬥爭，使得這一鬥爭迅速地得到了勝利。這樣，中國工人階級就大踏步地走上政治舞台了。

侵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是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最大敵人。帝國主義以侵略戰爭和使用壓力的方法，掠奪了中國的領土，迫使中國賠款，取得在中國駐兵及行使“領事裁判權”等軍事政治特權；同時控制中國的海關和通商口岸，取得在中國辦銀行、設工廠、開礦山、築鐵路和內河航行等經濟特權，控制中國的國民經濟命脈，使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着中國人民的生存，並阻礙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政治的進步。而且，帝國主義者爲了奴役中國人民，就要依靠當時中國的統治階級——封建勢力的幫助；而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以滿清朝廷和以後的軍閥政府爲代表的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在

遭受到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打擊之後，很快地就投降了帝國主義，並依靠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來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在這種情形下，封建統治階級對於中國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更加加重了。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發展中國民族的生產力，實現國家的獨立和民主自由，就成了中國人民的根本要求。

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並把中國由獨立國變爲半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中國人民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對中國的戰爭、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中以及在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運動中，不屈不撓地爲反抗外敵、保衛中國的獨立而鬥爭。中國人民並進行了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兩次國內革命運動，以推翻腐朽反動的滿清專制統治，特別是辛亥革命，更帶着比較完全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即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終於推翻了滿清專制統治。中國人民的這些鬥爭，使帝國主義不能完全滅亡中國，並喚起了更廣大的人民羣衆，去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但是經過歷次的鬥爭，中國人民都未能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下完全解放出來，辛亥革命也失敗了。這是因爲那時中國革命還沒有堅強的領導者——近代的產業無產階級，或者是因爲無產階級還沒有組織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中國人民還沒有找到勝利的革命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辛亥革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的。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中國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動搖的，他們一方面害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另一方面也害怕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中國農民在人數上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並且有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切身要求，但是他們因爲受到落後的生產方法的限制，看不到鬥爭的前途，所以他們也不能擔任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只有中國近代產業無產階級，才

能擔負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但是中國無產階級要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就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而這樣的條件，在五四運動以前是還不具備的。

但是，帝國主義的侵人，既然逐步地把中國經濟變爲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部分，這也就使得中國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兄弟無產階級的命運聯結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砲響，就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革命的武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資本主義的歐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即無產階級的、科學的共產主義思潮，在五四運動前後也在中國傳播起來了。

參加五四運動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即這個運動的左翼，因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傳播了中國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觀點，傳播了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觀點，並開始在工人中間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

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的結果，產生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

一九二〇年五月，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統一的革命領導組織——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後來因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宣佈解散）的幫助下，在上海出現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同樣的小組隨後也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杭州等中心城市和在日本、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中組織起來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因警察壓迫，會址移到嘉興），出席代表有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同志等十二人，代表着五十多個黨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選舉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這次大會以前，黨就驅逐了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出黨，在這次大會上，又斥責了拒絕進行非法革命工作的“合法主義”觀點，和主張黨應以無產階級專政爲直接鬥爭目標而反對參加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左”傾錯誤觀點。這次大會除通過黨章選出中央機關外，還討論了職工運動問題，並在會後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爲職工運動的指導機關。

出席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毛澤東同志，是湖南的黨組織的代表。“毛澤東同志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在湖南組織了革命團體，在一九二〇年又組織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並於同年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任黨的湖南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的工作，使湖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成爲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最發展的省份之一。”^①

一九二二年七月，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黨員約一百人。大會討論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通過並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宣言中破天荒第一次地指出了中國目前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宣言中指出了中國人民的當前基本任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爲真正民主共和國”，然後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言正確地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將是中國革命的領袖軍；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中的最大因素，而大量的貧苦農民如能和工人攜手革命，便可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小店主、小僱主等）是勢必參加革命的力量；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宣言指出當時孫中山的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便是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黨在宣言中提出組織包括各革命階級的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以爭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成功。宣言的缺點，是沒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

①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二版，第八頁。

導，沒有提出工人農民的政權要求和農民的土地要求，只是號召工人農民參加民主革命和爭取自己的權利。

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後，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之下，工人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從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有三十多萬工人舉行了一百多次的罷工，其中包括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三月進行的有六萬多人參加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一九二三年二月進行的京漢鐵路工人爲爭取組織工會自由而進行的總同盟罷工。這些罷工都是在共產黨員的領導之下進行的，絕大多數都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在罷工勝利之後，工人們都組織了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的工會。這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運動的迅速高漲，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已成爲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間，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受到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嚴重打擊。當時統治着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軍閥吳佩孚，用武力禁止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在京漢鐵路和其他許多鐵路工人進行罷工反抗之後，吳佩孚就在二月七日在漢口及北京長辛店等地對工人實行屠殺。工人死難者約四十人，受傷者數百人。這就是著名的“二七慘案”。

中國鐵路工人的英勇鬥爭，一方面表示了工人階級組織力量和革命積極性的迅速提高，因而大大提高了中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另一方面，這個鬥爭由於被鎮壓而歸於失敗，又證明了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並且必須擁有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才能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派。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展開了中國革命歷史的新階段：和五四運動以前的資產階級領導的不徹底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不相同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第二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日本、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重新加緊侵略中國，以及在各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各派軍閥連年混戰、殘酷掠奪人民，中國的產業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中國民族被奴役的危機也同時加深。中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空前惡化，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轟轟烈烈的中國第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爆發了。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一九二四年初共產黨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即“國共合作”)的形成，就是這次大革命的幾個重要的準備步驟。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黨員三百人左右。這次大會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國共合作。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以及把國民黨改造成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的可能性。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政黨；它的前身是革命同盟會，是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主要組織者。它在政治上是一個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到地主階級反滿派的鬆懈的聯盟。在辛亥革命以後，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政黨；一九一四年，以孫中山爲首的一派在日本組成了中華革命黨(以後又改稱中國國民黨)，繼續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鬥爭。但是由於這一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沒有使自己和人民羣衆結合起來，因此它不斷地遭受失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蘇聯對中國及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平等友好政策，五四運動以及五四運動後中國工人運動的興起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再加上

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的加緊，這一切都推動了孫中山的進步，使他傾向於聯合蘇聯、聯合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政策。這就是當時使國共兩黨合作成為可能的基礎。

爲着和國民黨聯合組成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黨的第三次大會批判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以陳獨秀（他從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起即擔任黨中央的領導工作）爲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他們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讓資產階級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等到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後，再來一次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共和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另一種錯誤傾向是以張國燾爲代表的關門主義傾向。他們認爲黨不應當和國民黨實行合作，他們錯誤地斷定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力量，而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大會批評了這兩種錯誤意見，決定以共產黨員個別地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行國共合作，以便使國民黨成爲各民主階級的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大會却沒有對農民問題和革命軍隊問題加以應有的注意。毛澤東同志出席了這次大會，在大會上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同志當選爲黨的中央委員。

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在廣州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實現了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統一戰線。因而這次大會就成爲中國第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高潮的起點。由於有了當時的以國共合作爲形式的統一戰線和統一戰線的革命政策，由於全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迅速高漲，國民革命軍獲得了迅速的勝利。在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了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打敗了北洋軍閥，發動了廣大的在中國歷史上是

空前的人民解放鬥爭。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如果沒有人民羣衆的偉大革命運動的開展，北伐戰爭的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討論的中心即為羣衆工作問題，大會通過了關於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決議。這次大會，為羣衆鬥爭的新高漲作了組織上的準備。這次大會以後，黨領導了同年五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和同年六月開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省（指廣州）港（指香港）大罷工，領導了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領導了全國性的學生愛國運動，領導了廣東、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農民運動。在軍隊中，共產黨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工作，改善了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使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獲得人民的歡迎；共產黨員在作戰中勇敢無畏，流血犧牲，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中，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擴大了，一九二五年一月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時，黨員數目僅有千餘人，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黨在武漢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時，黨員數目就增至五萬七千九百餘人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和威信也大大增長了。黨已走出了它在成立初期的狹小範圍，而開始成為全國範圍的羣衆性的黨了。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當革命勢力進到長江流域下游，進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買辦資產階級最大的巢穴上海的時候，當上海工人已經武裝起義並佔領了上海，而農民運動已經迅速高漲，準備進一步根本打垮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根基——封建地主階級的時候，當國民黨的統治人物已經利用共產黨和革命工農的流血犧牲而取得了很大地盤的時候，以蔣介石、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按：在一九二五年三

月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即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地位)立刻就投降了帝國主義，回過頭來襲擊革命，破壞了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統一戰線和這個統一戰線的一切革命的政策，舉行了所謂“清黨”，兇殘無比地屠殺了無數的共產黨員、革命青年和革命工農。這種屠殺，首先是由蔣介石和白崇禧在上海大規模地開始。這就是著名的四月十二日的屠殺。四月十五日，廣州的國民黨統治人物隨着摧殘革命。七月十五日，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來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便在血泊中失敗了。

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不僅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當時各帝國主義之間沒有嚴重的分裂和戰爭，而是處在局部的穩定時期)的聯合進攻力量過於強大，而且特別是由於陳獨秀所代表的共產黨黨內右傾思想在革命的最後時期(約有半年時間)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的緣故。當時陳獨秀等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革命武裝的領導權。這種投降主義路線並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取得統治地位，以致當反動派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而使革命歸於失敗。

這一次革命的失敗本來是可能避免、至少是可能減輕的。因為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同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上所作的論中國革命底前途的著名演說中，就對中國共產黨內一部分人在許多根本問題上的錯誤提出過及時的批評了。斯大林同志在這篇演說中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指出了帝國主義者假手於中國反革命力量來干涉中國革命、擊敗中國革命的嚴重危險；同時指出了：(一)軍事是中國革命的極重要因素，因為中國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對軍隊工作予以特別的注意。”“應當以一切方法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

作”，“應當研究軍事，以便逐漸向前邁進，在革命軍隊中佔據某些領導地位。”（二）必須展開農村革命，滿足農民的迫切要求，因為“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快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愈有力和愈強大”。（三）無產階級必須起來掌握領導權，並使中國的政權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權，成為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的政權。^①在斯大林同志發表上述演說之後，斯大林同志本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曾對中國革命所應採取的策略連續地給了詳盡的指導。但是陳獨秀却沒有聽從這些寶貴的意見，致使革命遭遇到嚴重的失敗。

事實上，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是受到反對的。早在那時，毛澤東同志就應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階級關係，認識了工人階級能否實現對於農民的領導權，乃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二四年底就着手研究湖南的農村情況並領導農民進行革命鬥爭，又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主持廣東的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致力於訓練領導農民運動的幹部。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所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並且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②

在革命的最後時期，革命的最迫切的、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農

① 參看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版，第一四〇——一四九頁。

②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二版，第八——九頁。